



2020 年 03 月 18 日

宏观研究

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——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系列之 12

投资要点

分析师：李奇霖

执业编号：S0300517030002

电话：010-66235770

邮箱：liqilin@y kzq.com

分析师：张德礼

执业编号：S0300518110001

电话：010-66235780

邮箱：zhangdeli@y kzq.com

近期报告

《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国际科创中心——

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系列之 11》2020-03-02

《评 1-2 月进出口：贸易余额可能继续为负》2020-03-07

《对 2 月物价数据的几点思考》2020-03-10

《银行盈利还有多少空间？》2020-03-13

《全年经济数据的“单针底”》2020-03-16

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

湾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海港优势、开放的经济结构、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，集聚了大量人才、资金、技术等生产要素，进而引发了湾区持续性的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变革，这使得湾区往往成为一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。

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呢？因为它的发展历程中，其扮演了三大角色：

一是改革开放探路者。一方面，港澳地区经济率先发展，珠三角则通过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“先走一步”，充分发挥毗邻港澳优势，带动本地区经济腾飞，并将探索出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全国。另一方面，粤港澳大湾区利用制度优势和港口优势，率先开展中外资合作，发展对外贸易，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。

二是产业升级引领者。改革开放四十年间，广东省产业升级趋势非常明显，先进制造业、高技术产业、现代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。而在产业升级的同时，广东省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向外转移，实现了湾区“先富”带动中西部“后富”的政策效果。

三是科技创新先行者。广东省政府的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步伐一直领先全国，在政策带动下，目前广东省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，并且由于知识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，同时还带动了其他地区科技进步。

有理由相信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成熟湾区在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。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，随着中国积极调整区域战略方向，逐渐摒弃传统的“均衡”思维，而更加注重打造经济增长极，推动城市群发展，粤港澳大湾区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，其战略性地位也将进一步提升。

风险提示：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



目 录

一、湾区经济的重要性	3
二、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？	5
(一) 改革开放探路者	5
(二) 产业升级引领者	12
(三) 科技创新先行者	15
三、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	19

图表目录

图表 1：若作为独立经济体，四大湾区 GDP 规模均可进入全球前 20 (单位：万亿美元)	4
图表 2：2018 年四大湾区 GDP 占所在国 GDP 比重	4
图表 3：2018 年四大湾区人均 GDP 均高于本国人均水平	5
图表 4：广东省与中央围绕“先走一步”策略开展的良性互动	6
图表 5：广东省典型国企改革模式	7
图表 6：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公有制经济占比不断走低	8
图表 7：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为全国之最	9
图表 8：广州港和深圳港货物吞吐量占全国主要沿海港口比例在 10%左右	9
图表 9：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远超其他湾区	10
图表 10：广东经济的外贸依赖度较高	11
图表 11：来自中国内地的转口货值占香港总转口货值的比重在 60%左右	11
图表 12：2000 年广东省各行业区位商	13
图表 13：十二五期间广东省产业升级方向	14
图表 14：21 世纪以来广东省部分产业开始向省外转移	15
图表 15：2008 年《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》中的发展目标	16
图表 16：2018 年广东 R&D 经费规模位列全国第一，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三	16
图表 17：2018 年广东省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全国最高	17
图表 18：2017 年广东省新产品销售收入全国最高	18
图表 19：2015 年全国区域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	19
图表 20：城市群建设相关文件	20



成熟湾区往往是一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，且基本都是所在国的经济增长极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湾区将继续强化其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领先地位，这使得成熟湾区在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提升。

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，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历程中，粤港澳大湾区扮演着改革开放探路者、产业升级引领者和科技创新先行者的三大角色。

一、湾区经济的重要性

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区域集聚性，即少部分区域创造了一国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，而湾区正是这少部分区域中最为突出的组成部分。

全球迈入海洋经济时代后，湾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海港优势、开放的经济结构、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，集聚了大量人才、资金、技术等生产要素，进而引发了湾区持续性的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变革，这使得湾区往往成为一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，进而引领和带动本国经济发展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旧金山湾区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，成为了全美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，聚集着苹果、谷歌、英特尔等大量世界顶尖科技企业，深刻引领着全球科技变革。

纽约湾区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世界级湾区，早期从港口贸易起步，逐步发展为美国制造业中心、全球金融中心。而如今纽约湾区知识经济崛起，文化创意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正在迅猛发展。

东京湾区则是日本的“经济心脏”，以 3.5%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超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值。电子、机械、汽车等产业高度发达，目前正在通过核心技术的创新巩固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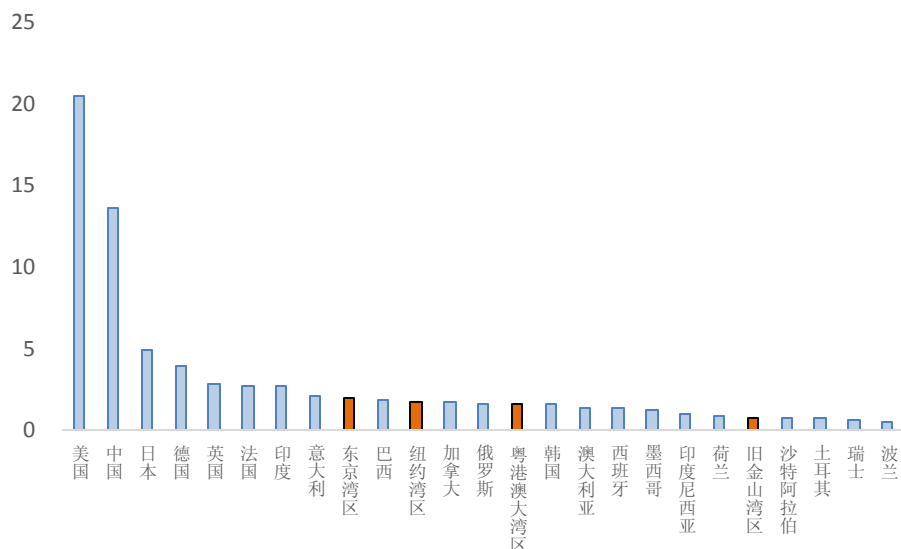
而粤港澳大湾区也同样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、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，随着多年发展，现已逐渐跻身世界级湾区之列，并有望成为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。

若将四大湾区作为独立经济体，则其 GDP 规模可媲美全球前二十国家。2018 年东京湾区 GDP 规模为 1.92 万亿美元，居四大湾区榜首，纽约湾区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旧金山湾区分别为 1.72 万亿美元、1.64 万亿美元以及 0.84 万亿美元。

其中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 8 和第 10，超过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大国，粤港澳大湾区超过韩国位居第 13，旧金山湾区排名第 21。



图表1：若作为独立经济体，四大湾区 GDP 规模均可进入全球前 20 (单位：万亿美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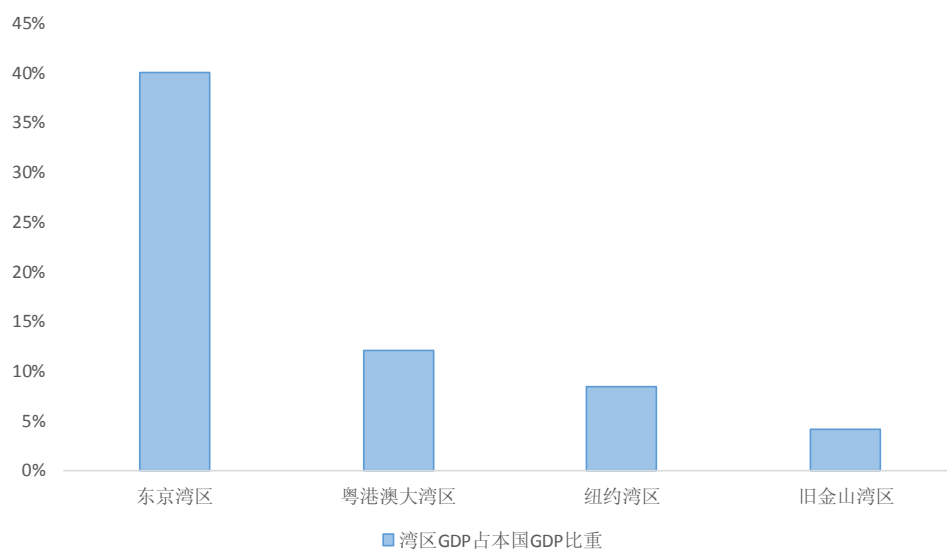


资料来源：wind、世界银行、粤开证券研究院

再从各大湾区在本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看，2018 年东京湾区、粤港澳大湾区、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占全国 GDP 比重分别为 40%、12%、8%和 4%。

其中东京湾区经济集聚性最强，在日本经济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。粤港澳大湾区虽然算不上主导，但经济体量也领先全国，重要性凸显。相较之下，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美国经济比重均未超过 10%，主要是因为两大湾区人口和土地规模偏小（如旧金山湾区人口只有粤港澳大湾区的 1/9），同时也和美国各大城市群发展相对均衡有关。

图表2：2018 年四大湾区 GDP 占所在国 GDP 比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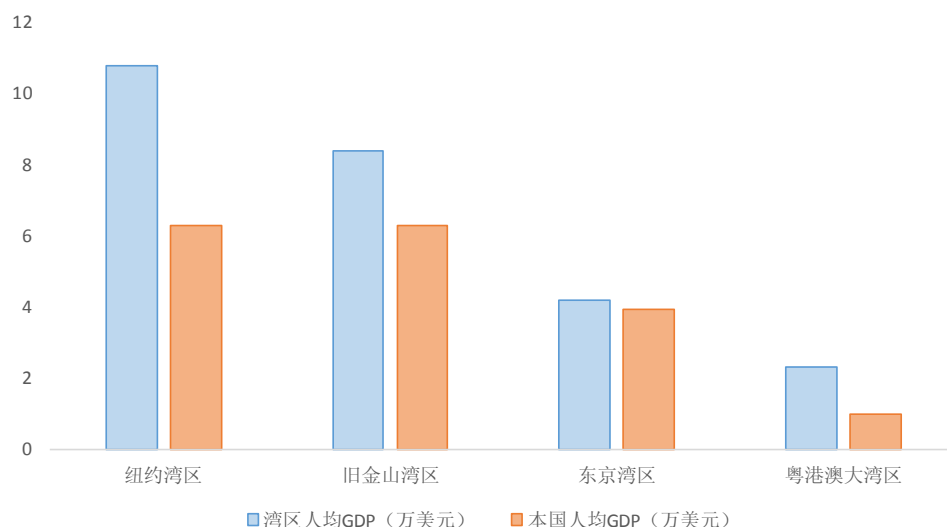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、wind、粤开证券研究院

最后从各大湾区人均产出来看，2018 年旧金山湾区、纽约湾区、东京湾区、粤港澳大湾区人均 GDP 分别为 10.8 万美元、8.4 万美元、4.2 万美元、2.3 万美元。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尽管经济总量最小，人均 GDP 却最高。



与此同时，四大湾区人均 GDP 都高于本国人均 GDP 水平，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均 GDP 为 2.31 万美元，远超中国 0.89 万美元的人均 GDP。

图表3：2018 年四大湾区人均 GDP 均高于本国人均水平

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、wind、粤开证券研究院

上述数据对比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，即湾区在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，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经济效率来看，发展水平都高于其他地区。而湾区经济重要性日益提升的背后，是其独特经济功能的发挥，这使得湾区经济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地理经济概念，显著区别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。

二、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？

粤港澳大湾区何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呢？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历程中，粤港澳大湾区扮演着改革开放探路者、产业升级引领者和科技创新先行者的三大角色。

（一）改革开放探路者

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不断调整的时代背景下，粤港澳大湾区扮演了改革开放探路者的重要角色。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湾区的显著不同点之一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缺乏相关经验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成为了中国探索前进的重要思路。由于毗邻港澳，广东省成为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、排头兵，这为其经济腾飞创造了重要的制度条件，而广东省成功发展的经验，反过来又对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。

首先是改革，最主要包括两点：一是中央给地方政府放权，二是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，核心是政府给企业放权。通过体制改革和权力下放，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。

第一，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与中央的良性互动，推动了中央-地方关系调整，增大了地方自主权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广东省政府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，发挥其毗邻港澳的优势，通过引入外资，开展对外贸易等，推动广东省在经济发展问题上“先走一步”。围绕这



一问题,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展开了多次互动,中央对广东“先走一步”策略给予了高度肯定。

在广东省政府多次主动“要权”下,最终在 1979 年,中央正式决定在广东、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,给予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更多的自主权,并且在物资供应、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准予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。

同时,在采纳广东省提议的基础上,中央做出了开办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等出口特区(后改称“经济特区”)的决定,而这些特区城市则拥有更大的自主权。

图表4：广东省与中央围绕“先走一步”策略开展的良性互动

时间	事件
1977 年 11 月	邓小平视察广东,希望广东能“先走一步”。
1978 年 4 月	中央向广东省指派习仲勋作为主政者。
1978 年 5 月	习仲勋会见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,并撰写《港澳经济考察报告》上报中央,明确提出建立宝安、珠海出口基地计划。
1978 年 10 月	广东省革委会向中央上报《关于宝安、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》,国务院在 1979 年 2 月批复,且给予了大量政策资金支持。
1978 年 11 月	习仲勋等人出席中共中央会议,会上指出希望中央给予广东省更大的自主权。
1979 年 4 月	习仲勋等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发言,提出“希望中央给点权,发挥毗邻港澳优势,让广东先走一步,放手干”,并且指出了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。
1979 年 5 月	广东省委向中央提交《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,扩大对外贸易,加快经济发展报告》,提出了在价格、财政、外贸、流通、工资等多方面改革权限的下放。
1979 年 7 月	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、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,同意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,广东省“先走一步”若干政策正式上升为国家政策。

资料来源：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

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此轮广东省与中央的良性互动,揭开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权力下放地方的序幕(尽管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,央地关系已经历了多轮“放权-收权”循环,但权力仍呈高度集中状态)。在广东省政府的带动示范作用下,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从单向指令传达关系,转变为双向互动关系,这也确实推动了中央在经济层面上对地方简政放权常态化。

例如 1980 年后,我国由原来的“统收统支”体制改变为财政包干体制,即在中央领导和计划下,地方结余留用、自求平衡,财权下放地方。除此之外,地方政府也逐渐获得了包括投资、外贸、吸引外资等方面越来越多的自主决策权,这充分激活了地方开展经济建设的积极性。

第二,在地方财权和事权合理扩张的基础上,广东省各城市在转轨市场经济方面,也率先开展了差异化的制度改革探索,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借鉴。

由于国营企业是旧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,因此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,则首先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国营企业改革。

国企改革初期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。1978 年广东省清远县打响了第一枪,对 4 家国营企业实行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”,使奖金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,最终改革成效显著,并向全国推广了所谓的“清远经验”。



而后随着国企改革愈发深入，广东省也同样在企业股份制、产权制度、现代企业制度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领域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。以深圳特区为例，颁布了国内首部关于国企股份化改革的地方法规，首次公开出售国企，率先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一系列突破性改革，这一系列尝试在国企改革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。

不仅是深圳，广东省各市在国企改革领域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，例如深圳市的“三级授权经营”模式、顺德的“分类改制”模式以及肇庆的“注资经营”模式等，各种改革方案创新在广东省遍地开花。

图表5：广东省典型国企改革模式

地区	模式	具体内容
深圳	“三级授权经营”模式	第一级授权，市政府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授权给市国资委；第二级授权，市国资委授权给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；第三级授权，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授权给国有企业，确立国有企业法人代表的代理人身份。
顺德	“分类改制”模式	对原公有制企业改革分为三种类型：对高科技企业、公共垄断企业实行国有资产控股；对竞争性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；对于扭亏无望企业实行破产拍卖。
肇庆	“注资经营”模式	以经营者和职工个人向全民所有制国有独资企业投入资金、入股国有企业为特征，即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，由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注资入股，把单一国有产权的国有企业转变为产权主体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。

资料来源：《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制度变迁研究》、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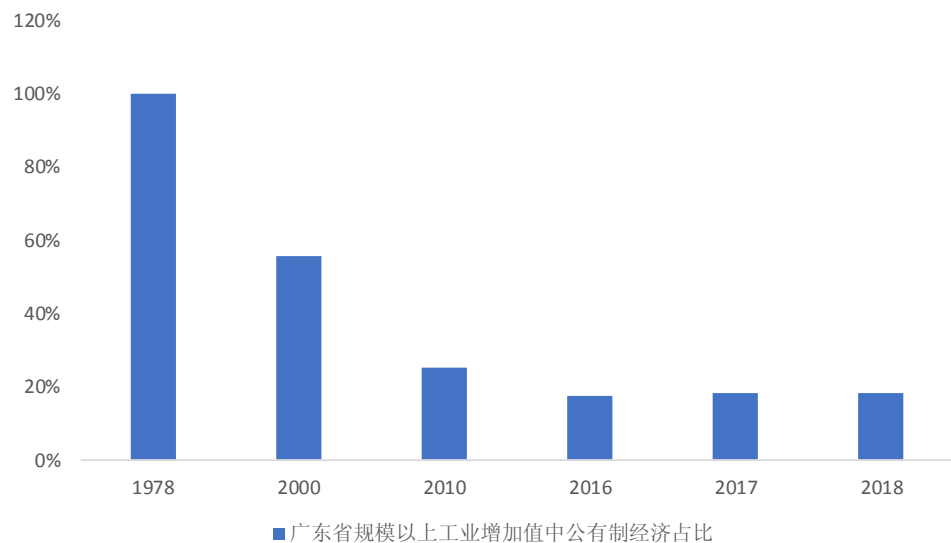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广东省在鼓励其他所有制企业发展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也先行一步。

例如广州市 1980 年发布了全国首个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文件，使得整个 80 年代广东省个体经济保持高度活跃。深圳在 1997 年开创了中国内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河，使原有的上千项审批与核准事项减去了近 43%，深刻地转变了政府职能，促进了经济活力。此外，商事制度改革也是在广东省率先启动，经过几年改革，全省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超过 90%，市场活力被大大激发。

正是因为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列，国企改革落实到位，同时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较快，因此广东省公有制经济（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、集体工业）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，从 1978 年的几乎 100%，下滑至 2000 年的 55.9%，而截至 2018 年，这一占比仅 18.2%。



图表6：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公有制经济占比不断走低



资料来源：广东统计年鉴、粤开证券研究院

此外，为了顺利转轨至市场经济，广东省也率先在价格、流通、劳工、贸易、投资、外汇、土地等领域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改革。例如广州在 1978 年率先进行“价格闯关”，放开了部分蔬菜和农副产品价格。再例如深圳在 80 年代初率先将行政分配工程项目转为工程招标模式，颁布了我国首个政府规章性质的劳动合同用工制度，率先对过往行政划拨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等。

粤港澳大湾区发挥的另一个作用，是充当中国的对外窗口。

一方面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，珠三角率先打破制度桎梏，充分发挥毗邻港澳优势，积极引入外资并发展外向型经济，探索中外资相关合作模式，这对于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。

1980 年深圳、珠海等经济特区正式设立，揭开了广东省对外开放的序幕。深圳、珠海等地通过实施关税、土地使用、外汇管理、企业经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，充分吸引外资、引进技术，并利用外商销售渠道发展对外贸易，带动了特区经济在 80 年代的迅猛发展，尤其是深圳特区。

而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，对深圳的对外开放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，继而掀起了广东省乃至全国对外开放的新高潮。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6414

